

腊梅花



内 容 简 介

这个集子选编了康濯同志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六四年的短篇小说二十六篇。这些作品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光辉指引下深入生活、陆续创作的，是努力实践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成果；生动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农村风貌，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插图：王菊生

腊 梅 花

康 濯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7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册 印张：16.125

统一书号：10109·1090 定价：1.18元

自序

本书二十六篇作品，是从我几十年来所写短篇小说中选出的。就算是我迄今为止短篇小说的一部选集吧。全部作品都曾发表过。除了个别两篇仅与他人的作品合编过集子，其余全都编入过个人的短篇小说专集。这些集子现在都已很难找到，其中几本我自己也没有了。这是“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及其反动“空白论”的恶果之一。今天重编和出版这一集子，自也是对“四人帮”的一个反击。

这一反击当然决不只是个人的事，而主要是读者和文艺界的需要。我这些作品，自己并不满意，事实上也写得并不高明。不过为了反击“四人帮”的扼杀和摧残，便不能不腆颜提起，作品中有的曾分别选入过去的高小、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课本，有的曾改编为电影、戏剧或连环画，有的曾翻译成外文或少数民族文字；这些事实就是说，作品都曾不同程度地在读者中产生过影响。

同时，这些作品也大多得到过文艺界的肯定。使我永难忘记的是，不久前令人哀痛至深地离开了我们的敬爱的郭沫若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国民党重重统治下的上海，著文、写信两次赞扬赵树理等同志的解放区文艺作品之时，也称道了我的短篇小说《我

的两家房东》，那对当时才二十多岁的一个青年的习作，实在是过分的奖誉。我也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冬我上晋察冀边区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的前夕，曾经把在脑子里酝酿了两年、又利用半年多工作空隙写成的两万多字的短篇《灾难的明天》，改抄了两份，通过不同路径分别寄往延安；那是日本帝国主义层层封锁下的两千多里途程，信件都是武装护送，谁知道我那区区的短篇能不能寄到！即使丢掉了又何足挂齿！可是，万没想到一年多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好久了，我这篇短篇小说竟然在延安《解放日报》连载发表，报纸还写了赞扬的评介。是哪个或哪几个同志背着这篇东西，在炮火中和黑夜里，或跑或爬或走地越过了敌人一道又一道封锁线？又是哪位同志把这篇东西送到了《解放日报》？我都永远没法搞清楚。后来不知又是哪位同志，把这篇东西连同《我的两家房东》和《初春》，通过国民党一道又一道险关带到香港，出了集子，并有评论文章予以肯定。在建国以后，我的短篇集《春种秋收》等作品，也得到过文艺界的肯定。而这些读者群众和文艺界曾经肯定过的作品，现在终于又冲破了“四人帮”一道又一道否定、禁锢的“封锁线”，同大家再次见面。并且同样使我难忘的是，去年冬天茅盾同志又在批判“四人帮”的讲话和文章中，肯定过我的短篇小说。而这些事实，我也同样是腴颜提起，目的仍然是为了反击“四人帮”。

显然也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近一年多便有不少读者以及大学中文系等单位来信，询问或索取我的短篇小说集，也提出了一些有关我的短篇或整个写作的问题。我回答过部分问题，有些问题则需要作品本身来回答，但我却无法寄给读者哪怕任何一篇自己的作品。因此，现在经过湖南人民出版社同志的努力，搜集资料并协助我编成了本书出版，不用说这自是切合目前需要的。

二

我已说过，我的短篇小说并非是什么杰出非凡，或并无缺点错误。事实绝不是这样，何况自己也难于对此全面评说。在这里，我只想一般回顾一下自己短篇创作的若干情况。

这二十六篇小说的写作，可分为建国前后两个时期。我是一九三八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开始写作生活的，这以前也写过和发表过东西，那只是中学生的习作。一九三八年开始在延安的墙报上发表小说，一九三九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报告文学和散文，一九四〇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这样直到建国为止，不计报告文学、散文、儿童故事和民间故事等作品，我大约写了三十多篇短篇小说；绝大多数是在晋察冀边区群众团体的工作岗位上，业余所写。这些作品约有二十来篇发表过，有几篇没有发表而至今仍留有原稿，有几篇则是没发表而原稿也已丢失，此外，战争中发表过的，也有几篇已找不到报刊所发稿样，更无原稿了。这些作品的丢失，也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一九四二年前后，我在自己订的一个白报纸本上连续写了几篇小说，每篇都在万字以上吧，因为当时战争环境十分艰苦而没有报刊可以发表；而我所在的群众团体有个剧社，社里一批比我还年轻的十几岁的演员和写作、音乐等爱好者，他们缺少书籍、读物，便把我那个手稿本借去阅读，后来却不慎辗转丢失。这件事想来未免遗憾，不过却也反映了文学艺术在战争中的点滴侧面，该也是略堪回味的吧！至于另两种丢失稿件的情由，一是在敌人“扫荡”、进攻中和机关文件一道坚壁或转移，不幸同遭损失；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下，被抄家丢失。

这后两种丢失，尽管对革命来说是微不足道，然而一旦提起，却仍不能不激起我对敌人的满腔愤怒。也正是由于这种丢失，有几篇我感到比现存者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还要较有意义的东西，现在已无法找到。本书中所选这一时期的作品，便也只有排在目录前面的九篇。

从建国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这一时期，除了其它体裁和形式的作品，我大约写了五十来篇短篇小说。相当一部分是在担任文艺组织工作或兼任农村实际工作时的业余创作；另一部分是从事专业写作的时候写的。这十七年中我主要是在做文艺组织工作，除了去农村生活和工作，专业写作只有前后两段，一共不到四年。而不论专业和业余，也不论是所写短篇小说或另外的中、长篇小说等作品，我都还有一些尚未写完或尚未最后定稿，因而也尚未发表和出版过。这些已发表、出版或没发表、出版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被组织保存并退还了我，一部分也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而丢失。十七年中尚未定稿、发表的短篇小说约有十篇左右，其中一部分也已经丢失。至于发表、出版过的短篇小说则约有四十篇上下，本书选了这一时期、这一方面的作品十七篇。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六六年，共写了八十来篇短篇小说，发表、出版过六十来篇，本书选了二十六篇；这就是回顾之初所得的情况。

三

再进一步回顾，是我上述几十年的作品，大都比较集中地先后写作于几段时间：即建国前一九四三年左右抗日相持阶段的困

难时期，一九四六年左右日本投降后解放区开始土改和大发展的时期，一九四八、四九年老区土改后和建国前夕；以及建国后的一九五三、五四年合作化走向高潮的时刻，一九五八、五九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与一九六〇到一九六四年，也就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的前后。这里回忆所及，有几段时间无作品是因为没写，如一九四四、四五年间在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就谈不上写作；一九五五、五六年间主持《文艺报》工作，主要搞编辑和理论，只写了点评论和散文；一九六五年前后参加农村社教以及其它原因，也无从写作。另有几段时间则是写了并且也发表、出版了，但却没有选入。也正是这每一段时间的选与不选，恰恰都反映了若干并不是一般的、简单的、偶然的情况和原因。

首先是本书头两篇作品都写于一九四三年，那是在敌后解放区听了毛主席前一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看了有关报道和材料之后。《讲话》全文是一九四三年十月才发表，但在这以前得到的有关情况，就已使我们大为震动。那是我写作上生命攸关的一个决定时刻。从到延安之后，我就开始下乡；在晋察冀的十年，尤其是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农村和农民家庭里；建国以后，十七年中更有十五个年头到过乡下，有时一次将近一年之久。创作上，从延安开始，便一直几乎全部是写农村和农民的。然而在《讲话》之前，下农村，写农民，我却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最根本的是不懂得追求世界观和思想感情的改造，往往只凭个人兴趣，猎奇式地摄取一些感到新鲜的、先进的乃至落后的生活细节和语言等等，这样当然即使身在农村而生活无以深入，作品更无法写得深刻。因而一九四三年以前我虽也发表过几篇小说，除了丢失的，也还有两篇尚在，但显而易见是毫无必要选入本书的了。

一九四三年前后，正是抗日相持阶段的艰难岁月。毛主席的《讲话》，也正是粉碎了在困难时期从文化思想战线出现的反动思潮，并从而进一步系统提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一整套文艺路线和纲领。这同一时刻，晋察冀边区党和人民也粉碎了一场地主阶级在减租之后发动的反攻倒算。我参加了这一伟大的阶级斗争和反击，并开始按照《讲话》的教导，在斗争中自觉追求锻炼改造。同时便也开始自觉地真切体会到贫下中农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体会到为什么在农村大雨时节，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只忙着躲雨，而贫下中农却要冲向猛雨中去护卫庄稼和堤坝；甚至也体会到了贫下中农汇报日本帝国主义“扫荡”造成的损失，为什么要把母鸡写成“下蛋的鸡”。这一些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平凡，在当时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是多么宝贵！而本书第一篇《腊梅花》基本上是写的真人真事，并在一九四一年就已基本脱稿，但小说写到第五节第三段，那位贫农积极分子在自己的东家地主面前，对一位八路军老战友突然竟连招呼都不敢打的情景，作品就不应结束却又无法再写下去而不得不暂时结束了。怎么办？那两年的工作空隙，我时时翻阅和考虑这篇小说，却一直找不到结局。直到自己开始体会了《讲话》精神，同时小说主人公的模特儿那位贫农积极分子，一九四三年也确实参加了对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反击并取得了胜利，我这才又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补写了三千来字，结束了这篇《腊梅花》，作品也才成了现在的样子。那两年我类似这样改写的小说还不只一篇，《讲话》的精神哺育和推动着我的思想简直可说是出现了一点飞跃。那两年正是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年月，吃的经常掺合糠和树叶，工作也忙得很，但我仍然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好几篇小说，并写作和修订了《灾难的明天》。《初春》也是一九四三年写的，原题《平静的初春》，还在报纸上发表过，

现在本书所收是一九四六年改写和再次发表的稿样。《我的两家房东》也早在一九四四年打好了比较完整的腹稿，并向周围同志讲故事讲过不只一次，还得到过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帮助，一九四六年只不过花了一天时间就写下了这篇小说的。

从日本投降到建国前夕的几年，我参加了游击区的减租斗争，新区一年多的土改运动，和土改前后解放区的生产互助，以及第一次获得解放的中等城市张家口的工会工作。这都是带着任务，或带着工作队下基层，对完成所负重担和个人的锻炼改造，都不忘《讲话》精神而有所自觉。这时期随着党和人民日益取得巨大胜利的形势，自己的思想也日益乐观和逐步开阔，并且文思不断，业余的写作也得顺利安排。这时期的短篇，包括上面所提，以及本书所选前边九篇中靠后的五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

由于自己多年从事农村工作，建国后对农业的互助合作和社会主义改造，关心和注意自都较多较早。本书中写于建国前夕的《亲家》、《买牛记》，以及写于建国初期而没选入的其它小说，就反映了老区农村土改后的互助组活动。一九五二年以后，我又连续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办社、扩社和整社。我不忘《讲话》教导，即使在《文艺报》的繁忙工作里，也曾抽空下去。在农村不论是短期的或较长时间的工作，往往仍和战争中一样在贫下中农家吃“派饭”，一户吃一天。这一时期，还有感于自己思想上对社会主义准备不足，而比较认真地看了一些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也反复学习了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系列文件。这一时期自己思想上也可说是又开始引起了若干飞跃，即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飞跃。当时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种种激动人心的艺术原料，至今对我还新鲜地历历在目。我反映合作化的短篇小说这时期也写得较早较多一点，本书已选入

后十七篇中的前面八篇。

一九五〇到五二年，以及一九五五到五七年，由于行政、组织工作繁忙，我没有下乡或下乡很少。加之建国初期对农村前途搞不大清，思想不大能跟上；一九五六、五七年思想更有点混乱；因而这两段时间写小说较少，所写的意义和水平也较一般，本书便没有选入。

一九五八年以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起，我又到农村参加了工作，也仍记住《讲话》教导而注意了锻炼改造。但由于对大跃进的形势认识不够，思想有些赶不上，加之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又影响了生活的深入，因此这一时期除长篇小说的创作或须另予考虑外，短篇小说的水平和质量显然缺少新的进展。接着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的前后，情况也大体类似。本书选入的这七、八年中所写排在集子后面的九篇，比起来就没有多少新的突破，有的较之过去还显得力量较弱，甚至只不过是反映了若干大跃进气氛罢了！

总括而言，这一段回顾所及的，是我整个写作上生命攸关的根本问题；也即是几十年来我能写出包括短篇小说在内的一些作品，而这些作品如果说还多少有些意义，在今天还能编印本书或出版其它作品的话，这完全是《讲话》教导的结果，是我按照《讲话》精神，在党和工农群众哺育下，不断深入生活，追求思想改造，努力艺术实践的结果。而一旦脱离了生活，哪怕只是暂时同生活稍有疏远，就至少会不利于创作，更不可能写出反映当前斗争的较好的短篇小说。此外，从这段回顾还可看到，短篇小说显然是最能致力于当前斗争的锐利武器之一，几十年来我也一直在努力掌握和磨练这一武器，不断争取较好地为当前斗争服务；同时为当前的作品也并不一定时间一过就再无意义，而往往是服务

得最好、最有战斗力的作品，还会长留下来，意义不衰的。这就是再加回顾后所得的一个根本体会。

四

另一回顾是如前所说，我包括短篇在内的所有作品，其中并非没有过缺点错误。事实上，仅仅在解放后的一九五七年左右，我就有个别作品受到过批评。本书中的《代理支书》（原题《代理人》），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受到过批判。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但不论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或以后，对我的批评有一些就都很有帮助，使我至今不忘。问题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混淆是非，挥舞反革命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而把我的全部作品和我这个几十年的共产党员，连同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和他们的作品，统统都一概诬为毒草；这就必须摆明真相，拨乱反正。为此，特对林彪、“四人帮”就我的作品栽诬的所谓两大主要“罪行”即主要的两顶帽子，略予驳斥，以正视听。这是我在另一文章中也同样提到过的。

一是诬我搞所谓“暴露文学”的问题，即实际是如何反映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问题。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编造过一套谬论，对于写阶级斗争但凡是不按他们的意图进行歪曲、诬蔑的作品，都一律斥之为所谓“暴露黑暗”、“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写真实”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然而实践证明，恰恰是林彪、尤其“四人帮”那些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才是最恶毒地歪曲生活，追求“现实主义深化”，凭捏造以刻划其所谓“真实”，从而把党和社会主义栽诬成漆黑一团，以疯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暴露文学毒草。至于说到“写真实”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

则是持此类论调者这在各个时期和各种具体观点上往往情况各不相同的，性质更有原则区别。有胡风之流和“四人帮”一伙反革命；有的则并无系统的论点，只是某一观点或某几方面包含着缺点错误而同上述论调有些联系，性质也仅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根本不能一概而论。

我在建国后的十七年中对于反映阶级斗争，言论和作品都有过问题，这在上面尚未提到过，主要是表现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二年前后。原因是自己世界观改造不够，对当时的形势认识上有偏向，思想有右倾。另外也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不知道农村中的许多问题乃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但又迫切感到这类问题文艺上应该反映，于是某些言论和个别作品中涉及这类问题时，难免路线不分，性质混淆，或则揭露了生活中的若干阴暗面而未能指出其根源乃是刘少奇路线，以至从效果上看，在一定程度上颇有使人感到将“暴露”的矛头指向了人民内部之嫌；或则又把路线斗争中属于敌我性质的问题当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又导致了否认阶级斗争的效果。这些问题，无疑也同文艺界当时出现的某些与“写真实”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有关的论调，在个别观点上不无联系。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和群众的批评教育，并结合自己的实际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我才逐步认识到的。

不过看本质和主流，十七年中我是如前所述，从建国前夕便开始在短篇中描写土地改革后农村互助组的生活，一九五三年又开始反映农业合作化，然后是人民公社化，并表现过三年暂时困难中农村的阶级斗争，乃至还实际联系到了当时的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书的后面十七篇就确切反映了这一系列情况。就是说，对于掌握和反映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和两条

道路的斗争，实践证明我在总的方面还基本正确而并无大错。文化大革命前夕，报刊曾批评过我在三年暂时困难中一度否认阶级斗争；这虽也如前所述并非毫无道理，但也正是在那一时刻，我写了本书中最后的《三面宝镜》和《代理支书》及其它短篇小说，而这两篇可恰恰描写了当时农村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受过批评的《代理支书》，其中虽然确有前曾说及的个别问题，但不用说当时也有过一些较好的反映，一个剧团据此改编的话剧似也还可以；即使从今天来看，这篇小说显然还同样会使人感到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阶级斗争中的某些重大问题，特别是领导班子的问题，这也正是紧接当时的社教运动所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甚至对今天的农村也还有意义。因而这并非什么坏作品，更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诬蔑的毒草。至于《灾难的明天》、《买牛记》、《第一步》、《太阳初升的时候》等篇被斥为毒草，就更是毫无根据的棍、帽乱挥了。也正因为“四人帮”如此颠倒黑白，本书中就不仅选入了上面四篇小说，并且还修改了《代理支书》中的个别问题而同样选入了，特一并就此郑重说明。

二是所谓写中间人物问题。我们无产阶级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在人物塑造上当然应以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为主，这就是毛主席教导的应主要表现“新的人物”。同时毛主席又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文艺界曾经出现过的“写中间人物”的论调，其中有一种主张倒确是或多或少离开了这一前提，在政治上把广大劳动农民都看做所谓有着动摇性的中间人物，并且实际是要求文艺歌颂、欣赏和展览这类人物；此种观点显然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是错误的。不过这毕竟还只是观点问题，

而并非敌我性质的矛盾。

况且这也不是仅此一家的论调，只不过各式各样持此论者的情况和性质也各有不同。多数属于认识问题，或并无系统的论点，因而也只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最反动的则莫过于胡风诬蔑劳动人民都背负着什么“精神奴役的创伤”，并要求文艺极力歌颂这类“创伤”的谬论。“四人帮”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打着什么文艺的“根本任务”在于“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幌子，实际却是一味美化他们一伙反革命死硬派，而把无产阶级革命家栽诬为“走资派”，把工农群众歪曲为浑浑噩噩的、中间状态和落后状态的群氓。但他们又倒打一耙，把三年困难时期在“写中间人物”问题上出现的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统统搞成敌我矛盾而大兴杀伐，这当然是别有用心了。

我在所谓“写中间人物”上也有过问题，这就是一九六二年前后，过分强调和宣扬过写中间、落后状态人物的必要和这方面的某些作品。不过我主要还是立足于对这些人物的批评、帮助和教育，而不是沉溺于歌颂、欣赏和展览。同时我也并没忽视过应以创造工农兵的、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为主，尽管一九六二年前后对此也有强调不够之处。但在总的方面，不论是十七年中乃至战争时期我所写的短篇小说和其它作品，或是这一集子中的二十六篇，我都一直是以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主；同时除了极少数两篇之外，又不论是本书中选和没选的、以中间状态或落后状态的人物做为主要人物的小说，我也都是从批评、帮助和教育出发。因此，在所谓“写中间人物”的问题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略加这一说明，我感到也很有必要。

从本书中的作品，来看林彪、“四人帮”对我的创作所挥舞的主要两根棍子和两顶帽子，并予以反击、批判，以正本清源，这

就是又一回顾后所得的情况。

五

最后还可回顾的是，有关我的短篇小说中题材、体裁、形式等问题。我绝大部分写的是农村，其它方面生活不熟，反映极少，只有描写工人生活的《工人张飞虎》，描写运动员生活的《关键的时刻》，以及涉及知识分子改造的《我在乡下》等篇，本书也就特意把这几篇收入在内。

几十年来，我也曾写过些反映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故事。本书选入了《小社员》这篇小说，这也是曾编进高小课本并翻译成外文的一篇。

另须提到的是关于短篇小说的体裁，其形式上的主要特点之一本来是短，即篇幅较短小。我国古代的《唐宋传奇》和《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法国莫泊桑、俄国契诃夫和美国欧·亨利这些短篇大师的小说，就有不少名篇都不过千把字、两三千字甚至还更短。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的小说，也同样包含了这一突出特点。而我们当代的短篇则虽未丢失这一特色，解放前后甚至也一再提倡和出现过一些小小说和墙头小说，但却有很多作品的篇幅往往在万字以上，两三万字上下的也屡见不鲜。从我个人的写作体会来说，这同我们当前生活的丰富、复杂和变化的急剧显然不无关系，不过同时也显然和我们在短篇小说体裁上引导文学青年努力掌握与磨砺不够有关；而“四人帮”对艺术钻研的绞杀，在这一方面更有着极其恶劣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我在这里也顺便回顾了本书中的二十六篇作品，篇幅万字以下的才十三篇，刚好占一半，五六千字以下的不过五篇；至于《半天空里彩花飘》这

一篇甚至还算不上小说体裁，不过是生活一角的瞬间速写，但因为只有千多字，在我所写这一类作品中似还比较接近墙头小说的样式，也就勉强收入了，以示对自己的督促并加以提倡吧！

最后关于本书的书名，定为《腊梅花》，并非因为这一篇有什么突出的特点，只不过这是我学习《讲话》精神后完成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如果没有《讲话》的指引，这个作品也就难于问世。其次是在本书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的目录中，这篇又列在最前面。此外则是在我被禁锢十来年而去年报刊上重又提到我的活动后，我接到的读者来信中，想不到竟有一位还念念不忘地谈起了二十多年前他看过《腊梅花》后记忆长留的感奋。我也就根据这三点不无意义的情况，确定了这一书名。

编辑和出版本书，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砸烂了他们的“文艺黑线专政”等谬论的结果。这对我紧跟华主席、党中央，在毛主席伟大旗帜指引下，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的长征中，继续遵循《讲话》的教导，努力写出新的较好的作品，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实在是说不尽的巨大鼓舞和激励。而面对这一鼓舞和激励，想到短篇小说是我锤炼了四十来年的一个主要武器，长期钻研中产生的深深爱好，以及过去我的短篇主要只写过自己熟悉的华北农村生活，对自己家乡湖南农村生活的反映自还需补上；这更督促着我誓要永远拿起这一武器，以不断发挥其战斗力。在今后继续长征的路上，这是我当时时刻不忘，竭力争取做到的。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日。

目 录

自 序.....	(1)
腊梅花.....	(1)
灾难的明天.....	(26)
初春.....	(59)
我的两家房东.....	(66)
明暗约.....	(87)
工人张飞虎.....	(98)
亲家.....	(136)
我在乡下.....	(150)
买牛记.....	(162)
竞赛.....	(177)
一同前进.....	(200)
第一步.....	(228)
最高兴的时候.....	(262)
牲畜专家.....	(277)
小社员.....	(297)